

血火名城

历史的重现与哲学的反思

钟沈军 何建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6/12/27

血火名城

历史的重现与哲学的反思

钟沈军 何建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如虹

装帧设计:陈 新

血 火 名 城

——历史的重现与哲学反思

钟沈军 何建明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

字数:235,000

ISBN 7-5438-3035-3

K·646 定价:18.00元

长沙大火

雷洁琼题



撫滄桑歲月
振古城雄風

題“千年祭”紀
古亭見明



遠見卓行
只爭朝夕

袁隆平

2001.6.13.

历史不可忘记

谭仲池

我很少为人作序。写过两篇，都是应朋友之邀，故不会生出别的什么。加上我不愿讲恭维话，也就没有不负责任之嫌。这次因了谭谈兄的介绍，我才决定又一次去写读后感。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能够用新闻笔触对重大历史事件长沙文夕大火进行研究、记叙和思考，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作者没有完全按照历史著述的前因后果进行铺叙，开篇即由旷世火劫入题，点出当代名人对火劫的痛苦回忆，最后又把历史拉近，描绘了长沙60年用她的“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努力使她的文化命脉得以接续，使她名城风采更见辉煌”，实现凤凰涅槃的伟大复兴。长沙文夕大火不仅是20世纪最大的火劫、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分水岭，而且十分突出地体现了长沙人民不怕牺牲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当年，是长沙人民以其伟大的英雄气概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和悲壮；如今，又是长沙人民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实现了复兴，显露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湖湘文化的底蕴。

1938年11月12日夜的长沙文夕大火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责任在谁，一直是史学界未能完全弄清的问题。过去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和张治中想建奇功所致，当时就有一幅对联：“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张惶失措”，用以讥讽张治中。又言“潭州文物几千年，一炬成灰万古冤；焦土未能寒敌胆，荒唐绝顶史空前”。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和幸存

者，“在整整的一年里，年轻的记者尝试着以学术的耐性和沉着，横跨五省市，走访尚存的证人，翻开尘封的档案，辨识模糊的图片，查阅今昔城市的地表，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艰辛地打捞，在茫茫众生中苦苦追寻”。为文夕大火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素材；另一方面，作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从张治中的政治思想活动以及毛泽东、周恩来事后的果断处置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表明了大火的最终责任者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作者的这种研究精神和客观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正如历史大家刘大年所说，“研究大火事件，如果脱离开大火以前的时代背景是荒唐可笑的。”

在研究和记叙历史之际，作者再一次发出了历史不容忘记的呐喊。文夕大火，使近万人葬身火海，30万居民流离长沙，漫长的风雨岁月、历史风云和世纪沧桑缔造的历史文化名城付之一炬，长沙为整个民族的抗战付出了“最悲壮最伟大的代价”。然而，“鲜有人知道湖湘殉难文化与日本的武士道在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战场进行的殊死拼搏”，“20世纪最大的火劫却静静的躺在历史的长河里”无人关注，“长沙历史上这悲壮的一幕未曾开启就几乎永远关闭了”。同时作者也指出，战争的灾难是双方的，原子弹的蘑菇云也带走了长崎、广岛的城市繁华，中日人民都应吸取血的教训。然而，在德国总理勃兰特怀着正视历史、热爱和平的胸襟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跪倒之时，日本内阁成员却在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为战犯招魂；在美国和加拿大因在二战期间对日侨和日裔国民的不法行为给予赔偿之时，日本政府却对二战中的旧军人、遗属发放抚恤金，散布“南京大屠杀捏造”论，提出“南京大屠杀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中国人放弃赔偿？”历史的教训应该给我们以什么警示？作者喊出了“我们带着耻辱和忧患走进20世纪，我们不能再带着耻辱跨越新千年”的历史心声。这正是我对年轻作者产生敬意之所在，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最感欣慰的

原因。

2001年3月10日于长沙

(谭仲池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国家一级作家。)

序

郑佳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 100 多年屈辱历史中惟一一次胜利的战争。中国人民为夺取这场最伟大最辉煌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各种各样的代价与惨烈的牺牲。南京大屠杀与长沙文夕大火就是其中两个典型。有历史学者认为，南京与长沙是二战中中国战场损失最惨重的两个城市。

长沙文夕大火是 20 世纪最大的火劫。至少 3000 多人葬身火海，一座千古名城化为一片火海焦土。笔者祖父在长沙经商，在半湘街曾拥有一间绸布店，一场大火，全部化为灰烬，从此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国难家仇，至今不敢忘怀。

长沙大火对长沙城市的打击，不仅仅表现在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上，更主要是表现为整个城市的毁灭。这是战争对文明的毁灭，是“国弱必然积病，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见证。大火毁灭的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一座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座繁华的商业都市。大火对长沙这座城市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截断了城市外在方面的千年沿革，也使城市失去了历史文化沉积的厚度，更中断了城市经济发展的脉络。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今日长沙尚不能跻身中国最先进城市行列，与 60 年前的这场大火不无关系。

长沙大火是为“焦土抗战”而起，无论学术界作何定论，但烧的目的是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是为了以釜间争取时间，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沙以整个城市的毁灭，整个经济基础的断裂和数千同胞的丧生，为民族抗

战付出了最伟大、最悲壮之代价。在随后的四次会战中，长沙成为二战历史上坚持抗战达5年零8个月之久的英雄城市。

居安思危，铭耻砺志，在长沙文夕大火60周年时，长沙市委市政府举行一系列祭悼活动，其中包括赞助老作家龙榆生出版纪实小说《名城血火》，长沙市政协编著历史当事人的回忆《长沙大火》、长沙市建委与文联编著《古今长沙大写真——文夕大火60周年专辑》，与新华社湖南分社、长沙市政协共同摄制文献纪录片《文夕大火》等。还将建成文夕大火警示钟，拍摄电视连续剧《名城血火》等。再现文夕大火对长沙历史文化形成的断层，有助于在长沙市民中广泛掀起一场爱国爱乡的教育，也是向世界广泛宣传长沙的有利契机。

本书作者之一钟沈军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作为新华社湖南分社参与电视片《文夕大火》摄制的工作人员，担任制片人与编导，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目前该片已获得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认为，该片抢救性的历史打捞，使某些采访片断成为具有“活化石”作用的珍贵的史料。尤为难得的是，本书的作者能够再次沉静下来，潜心追溯60载而上，以夹叙夹议的形式，从更高层次上对这一段本应让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进行了纵深开掘。“窥一斑而见全豹”，该书通过文夕大火这一辣味十足的故事的全方位剖视，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潇湘首邑长沙的城市性格与特色。书中有沧桑的历史，有厚重的哲学思考，有中日两国的百年恩仇，有湖南与日本之闻的比较分析，有大大小小事件轨迹的追踪，有历史见证人追忆的佐证，有记者本人的思考，有历史学家高屋建瓴的评述。与以前有关同一题材的作品相比较，该书拷问历史的形式，以思维见长。这种形式也是有关历史题材创作的一种大胆创新。这样颇费苦心的创作，没有一定的历史责任感是很难做到的。

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在日本大坂国际和平中心

竟然出现“南京大屠杀是 20 世纪最大谎言”的反和平逆流。警醒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教育后代子孙永记国难家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本书作者站在千年之巅，着眼于现实的史祭就更加振聋发聩。长沙城奋发图强，犹如火海焦土中涅槃的凤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兆与希望。

是为序。

（郑佳明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历史学硕士，《文夕大火》总监制。）

序

郭世佑

近期本有应接不暇的校内公务与校外学术交流活动，许多文债也在不断延期和不断偿还之中，实难他顾。当故友建明先生自北京来电，嘱为他和沈军先生的合著《血火名城——历史的重现与哲学的反思》献“序”时，我虽犹豫片刻，却仍不忍峻拒，只好下定决心承诺一试。这不仅因为我至今还没学会谢绝建明的任何邀请，而且无法漠视这两位非史学专业出身的同辈学人认真解读历史所展示的那份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在替吾辈职业性的治史者代劳而已，我们理当借此感谢他们。

建明与他的合作伙伴，一个是经济学硕士出身的金融界优秀管理人员，一个是出道有年的新华社记者。他们不是专心于自己的热门专业与行业中大显身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推波助澜或呼风唤雨，轻车熟路地先富起来，而是甘于寂寞，涉足冷僻而艰辛的史学领域，走街串巷做口述史调查，抓住“文夕大火”^①这一曾使许多潇湘父老家毁人亡或颠沛流离的历史话题，以犀利流畅的笔锋，揭示日军侵华行径的残暴，展示生命的珍贵，再现三湘儿女那不屈不挠的“蛮劲”、“挺劲”和“春风吹又生”的勃勃生机，试图穿越历史的时空障碍，构建起连接昨天与今天的桥梁，可望提醒那些年轻的读者群在染发、文身、泡网吧、当追星

^① 根据前日代日规则，“文”指12日，“文夕”当指12日晚上。不过，在当时，人们的时间观念远不如今日精确和在意。准确地说，大火引发不在12日晚上，而是13日凌晨2时左右，是无畏大火，而不是“文夕大火”，只是人们至今如此习惯地称呼而已。

族、吃麦当劳或肯德基的同时，也别忘了多灾多难的祖辈与父辈们的鲜血就曾在我们的脚下流淌，那些受尽折磨的身躯就曾在我们的脚下挣扎，是他们的斑斑血迹与累累白骨积淀成厚实的土基，支撑起我们今天的脚步，延伸着明天的何去何从。

回首 23 年前，我于负笈岳麓之初，即从师友的言谈与某些零星的文字记载中略知，与我们一同在阳光下呼吸的省垣长沙就在 1938 年 11 月 13 日凌晨，在“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名目下蒙受过一场可与 1812 年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之举相类似的吞城巨火，其来龙去脉却语焉不详。粗阅《血火名城——历史的重现与哲学的反思》，可知作者不仅参考了许多已刊文字资料，还做过若干口述史采访。上访对象中，既有制订焚城计划的原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与闻焚城机要的原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的秘书吴世佑，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当年执行公务的长沙宪兵团成员等，还有许多逃出火海的幸存者与目击者。全书征引之翔实，叙述之生动，便不足为奇。该书既具体描述了火案从发生到处理的全过程，也认真披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关于“焦土抗战”方略与焚城方案出台的由来；既详尽地记载了芸芸众生那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灾难，也简要地勾画了劫后余生的省垣人带着累累伤痕英雄般站立起来的丰姿，连同千年古城在狼烟滚滚的废墟上横空出世的艰辛与奇迹。尽管个别史实的表述似乎有待进一步斟酌，但作者不是囿于浓烈的乡土情结与家园恩怨，而是把长沙火案放在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去写实和分析，省却许多情绪化的话语，不仅视野开阔，而且立论相对平实，似非许多同类书籍所能企及。

“焦土抗战”的必要性及其实效既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对于学术界的见仁见智，该书既未置若罔闻，亦不曾

单凭个人兴趣随意取舍，而是将不同的观点列出，留给读者去判断，若以学院派的眼光视之，这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叙述方法之一。对于那些习惯于思考的读者来说，现成结论并不比思维空间更重要。史学研究也罢，现实生活也罢，那种喜欢用事物的结果推导过程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应当尽量避免。结果固然简单，但过程十分复杂，变量颇多。惟其如此，事后诸葛亮好当，事前的诸葛亮却不啻算命先生。每个算命者的算法与说法往往既含混其词，又因时而变，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验证。

“焦土抗战”固然属于国民政府谋求抗日的一种手段，但受焦的还是劳苦大众。无论政治家的口号喊得如何悦耳诱人，战争的代价还得由受害一方的人民去分担。无辜的人民常常在劫难逃，而且首当其冲，人类的残忍与世道的不公由此可见一斑了。在统治者决定“不资敌用”而实施焚城方案之前，广大长沙市民却一无所知。许多生灵要么为火海所吞噬，要么带着身与心的重痛侥幸地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艰难地求生于乱世，一如开封花园口决堤之后的无数黎民饱经水患之苦，不仅无家可归，哀鸿遍野，而且还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试问：这样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着和代表着曾经被梁任公所赞叹被孙逸仙所推举的国民？即便是古典传育中的“民本主义”，其“本”安在？

近代国人备受欺凌，这无疑与晚清以降的历代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只求敷衍塞责关系甚大。明火执仗的外来侵略者却丧心病狂，不仅劫财毁物，而且奸淫杀戮，无恶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为甚。但令人遗憾的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在死于纳粹之手的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日本当局至今却不愿承认他们的前辈在广袤神州的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至今不愿将近代日军的在华真相告诉给自己的一代。日本的历史教材就对1930年以后的事件避而不谈或少谈，更不纳入考试范围，我们无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说到这里，

我不禁联想起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往事。前年5月，当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北约集团的轰炸时，面对西方霸权势力对主权国家与国际法权体系的悍然挑衅，举世为之愤慨，我校有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却公开叫喊“炸得好”，甚至说“中国就应该灭亡”，如此不谐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园中成千上万的中华学子，差点酿成涉外事故。这个日本学生的表演显然不是偶然的。相比之下，一身正气的日本电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于今年2月22日晚应邀来我所作学术报告时，他根据自己在本国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来的资料，如实地披露日军对我中华同胞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事实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企图掩盖其细菌战的事实及其原因，赢得全所师生的阵阵掌声。可惜像他那样的日本学者为数并不太多，遑论一般的日本民众。我就打算趁12月到日本神户、东京等地赴会和讲学之机，回访近藤先生这位对中国人民深怀同情和友情的执着求索者，无论自己的访问日程有多紧张。《血火名城——历史的重现与哲学的反思》对日本当局至今公然为战犯招魂之谬举的揭露堪称清晰和全面，有关分析尤为精当。它在和盘托出日军侵华之真相与掩盖真相之动机，以理性为翅膀展开思路，可望激活国人的爱国情怀，使长沙巨火化为警钟长鸣，殆无歧义。如果有人说作者就在为迅疾提高国民的公德意识与文化素养而添砖加瓦，如同给喜吃辣椒者提供一份久违了火宫殿或玉楼东的辣味佳肴，当不为过。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善于记仇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像患失忆症那样善忘的民族。如果纠缠于过去，我们不会拥有轻松愉快的将来；但如果忘记过去，我们也难以拥有心底踏实的现在。时间本是一串既剪不断也理不乱的因果链。置身于这条链上的现实只能是承先启后的现实，无法另起炉灶。现实不是对历史的虚无与背叛，不能随意将自己延伸，杜撰未来。在时间的因果链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还是短距离的未来，三者都在手拉手、

肩并肩地朝着浑无际涯的广义未来延伸，而且都将成为历史。遗忘历史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历史或捏造历史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茫茫洞庭水，巍巍南岳峰。苍生多脆弱，难折是湘人。毁于一旦的古城长沙为何得以劫后重生，而且生生不息？后人从火患的无情与历史的沧桑中还能读出什么感触，可望获得哪些启示？本书作者在第16章倒是给读者提供了幽静而深邃的思路。建明拿出两年前撰写《苦我心志》一书的人文底蕴与学术功力，从两火相加的炎帝谈起，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时空，与忧国伤怀的屈子、贾谊对话，将首倡“师夷”的魏默深与笑看横刀的谭复生现身，透过屡败屡战的黄克强、断喝止水的蔡松坡等人的凛然浩气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胡耀邦等巨人式的身影，还有“惟楚有材”的学府风采、湘军脚下的雄关漫道，展示潇湘儿女隐忍自强的弘毅与荡气回肠的才思，体念舆棹出关式的激越与悲壮，追寻那“不吃辣椒不革命”的万丈豪情，感悟那务实与敢为相表里的地域神力与文化特质。对于三湘四水的历史积淀与文脉精髓，作者不仅旁征博引，如数家珍，而且文思不绝，有似滔滔江水。作者还独辟蹊径，仔细比照湖南人踔厉敢死的“殉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的差异，从而得出结论：日本的武士道“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视侵略为圣战，视屠杀为武勇，视疯狂为无我，视战犯为民族英雄……”作者还以抗日战争的全胜为背景，以今日中日两国之间实质性的外交关系为参照，一针见血地指出：“结局的辉煌让我们忘记了过程的残酷，尽管我们曾经饱经苦难，但我们却不喜欢咀嚼苦难；尽管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悲剧，但我们却是一个最喜欢‘大团结’结局的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印证了中国人的这种天性。直到当年失败的侵略者早已崛起并再次居高临下时，我们才感觉到面临新的竞争劣势，胜利者其实很苦涩。”读者诸君倘若